



栾梅健 主编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文学现代化”丛书

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

王 韬 著

Zhongguo Jindai Wenhua Zhuanxing
Yu Wenxue Xiandaihua Congshu



復旦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

王 韬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王韬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2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文学现代化”丛书
ISBN 978-7-309-11054-8

I. 西… II. 王… III. 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2475号

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

王 韬 著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75 千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054-8/I·869

定价: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外部研究”何以可能

——以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为例(代总序)

栾梅健

在对自晚清至当下的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梳理与研究中,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外部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过一段对资产阶级不无赞美的描写:“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他还指出了物质层面的巨变所引发的精神层面的裂变:“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认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必然发生变革,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简言之,所有意识形态的形式,都将会出现新的面貌。

以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为例,我们在长期的研究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外部研究”的重要性,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

性因素。

大致看来,中国的社会进程比西方整整晚了一、二个世纪。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被强行开放,中国原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众多的群众被卷入商品交流之中。在1900年前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通商口岸,迅速形成了人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不同于传统农村集镇的工商城市。在农村,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们,再也看不懂这个日趋怪异的世界。纱厂、小火轮这些从未听说过的玩意儿,似乎在梦境中一夜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即使在遥远的内地四川,那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不是由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的工业文明之一——铁路所引起的吗?这一切变动,是以往任何农耕文明时代所没有过的。难怪老通宝们在纳闷、不解之余,似乎若有所悟地感叹道: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当然,这种巨变势必会影响到文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学在生产、制作和传播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基础上的。机器的运用、铁路的开通、轮船的航行、邮电的发展、电报的传递……这些率先在西方出现的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在我国长驱直入。表现在文化上,机器印刷显示出比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更为巨大的优越性,工业造纸大大缩短了以往靠手工操作的时间,新闻事业的发达促进了新闻、通讯、文艺副刊的繁荣,现代交通则使文学有可能迅速成为商品在全国流通、交换。在这个时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终于得以形成。文学已不仅仅是一种爱好,还可以成为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所在。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作家已经在这里产生。这是一次真正属于社会形态变革的、工业文明范畴的转型。尽管在我国广大的内地、农村,这种变化并不是十分明显、强烈,然而在上海、广州、天津等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其工业化程度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甚至已不亚于当时欧洲的某些工业化国家。

作为感同身受地经历了当时社会的巨大转型、对晚清文学研究颇有建树的前辈学者阿英,在他那本著名的《晚清小说史》中一开头就这样谈到晚清以来小说空前繁荣的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刻书那样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在这里,作为“外部关系”的印刷事业、新闻事业、西洋文化影响等因素,被阿英提高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应该不是一个偶然、随意的安排。

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究下去,人们就可以发现,晚清当时诸多“外部因素”都一起参与到了文学的发展与形成之中。粗略算来,如下外部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近代出版。1843年,作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出版机构的墨海书馆在上海设立,其后,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编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纷纷出现。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文学作品不仅通过出版机构正式发表,而且新式出版借助近代出现的邮路、交通等方式将文学作品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造成了与古代书坊完全不同的文学传播形式与效果,并反过来影响与制约着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上的不同追求。

二、近代报刊。近代报刊与近代出版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报刊作为晚清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因而其在文学上形成的“报章体”值得特别重视。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在文学制度、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是如何破坏了旧的传统,或者建立了新的传统和格局,从而推动了晚清文学面向现代化。

三、近代思潮。以近代中西思潮的演变为论述的坐标,通过对当时的全球化思潮、进化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功利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

潮、资本主义思潮、复古主义思潮等等的梳理,辨析它们在近代的发生、成长、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使人们更加明了这些思潮与文学变革的关系,明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四、新式教育。1905年,清政府迫于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明令废除了空疏无用的科举制度;而在这之前,已有不少关于新式教育制度的倡议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新式教育在为社会造就着大批知识阶层的同时,也在培养着自己的读者队伍。这不仅使得新式读者具有与古代读者不同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趣味,而且它也使得作家的地域分布与性别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以外,其他如近代图书馆制度、邮政、铁路、公路等等诸多的“外部关系”,也都一并加入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建构与转型之中。在面对如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转型途中,将作家当作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作传播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作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种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颇有读圣之嫌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种必需的工作。

相对而言,对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结构、语言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它可以清晰地揭示出作品与社会、时代的对应关系,并能对人们的审美把握提供重要的借鉴。然而,当人们试图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宏观与史论性的描述时,“外部研究”便体现出它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一切偏重于文学本体内部的研究方法与体系,诸如精神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形式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等,在回答“文学是如何产生并如何生成”时,可能都会偏执于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评价。两者的互相补充,就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所必须都注意到的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率先在西方兴起的文艺社会学有许多的相同之处。法国当代评论家埃斯卡皮认为:“一方面

是文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广为传播,两者在 1800 年前后达到了临界点。正是在这时,文学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尺度。”^①埃斯卡皮是在评价著名文艺社会学家斯达尔夫人时说这番话的。1800 年,斯达尔夫人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首次尝试把文学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被誉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著。在 18 世纪的欧洲,知识的专门化促使科学和技术活动逐渐脱离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范围逐渐缩小。然而同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文盲的逐渐减少,从前作为一小批文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的文学变成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文学成为提高广大民众智力水准的手段。正是在这里,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具有足够的土壤。继斯达尔夫人之后,特别是自法国哲学家孔德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创立实证社会学以来,文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深入。在不断完善着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相当准确地映现出了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文学面目与文学流派。

现代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包含有下列三个要素:一是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上来分析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就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指出个人主义文艺建立在自由经济之上、危机感的小说建立在个人垄断时代之上、创造力趋向消失的小说建立在国家垄断时代之上那样,着力揭示出社会史对文艺史的具体影响。二是用社会学的具体方法(如统计调查法)来从事文学研究。它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是人们的精神产品(在近代社会则更具有“商品”的意味),注重研究这一产品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研究这种产品的创造者——文学艺术家同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传播媒介(评论家、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书展等)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研究文艺作品的消费,谁消费了什么?为什么?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形成

①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8 年,第 8 页。

客观公允的看法。三是扩展文艺社会学与其他各学科的联系。不仅把文艺作品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且也看作是一种审美事实。这是现代文艺社会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接受美学、艺术心理学,乃至其他一些着重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的长处,都可以被吸收拢来加以运用。现代文艺社会学已经不满足于论证特定作品同特定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对文艺的社会关系作出单向线性的解释,而是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考察文艺的社会关系,注重对整个文艺社会史作出评价。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将这一经典结论套用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对于农耕文明时期来说,我国古代文学中相对孤立、静止、单一的文学活动,在鸦片战争以后日趋工业化、商品化的社会大变局中,已经变得非常丰富、复杂与开放。脱离了对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可能就会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中理不出头绪,找不到方向。

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从事“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论”的研究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的地方。

2014年11月5日

于复旦光华楼

序

王晓华

对于现代性与近代中国文学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的学术界曾进行过初步的梳理,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是重视个人的自由主义。此后,新左翼的出现改变了重构的理路,开始凸显群体、民族、国家的意义。这种做法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但也引发了辩论对手的思想抵抗。于是,曾经困扰中国近代文学先驱的群己之争再度兴起,汉语知识界的精神天空又变得朦胧乃至暧昧。在这种情境中,选择沉默似乎是明智之举,但继续叩问真相更为重要:要确立前行的方向,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从超越的立场看问题,完整地重构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和脉络,为崛起的中国提供可靠的精神参照。

令人欣慰的是,知识界的一些后起之秀既展示了不畏艰难的学术勇气,又建立起超越性的学术立场,试图敞开被先前的立场之争所遮蔽的历史真相,全面重构中国现代性的诞生轨迹。王韬的努力就隶属于这个思潮。在专著《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中,他系统梳理了源于西方的科学思潮、进化论、启蒙精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华夏大地的线索,审视中国知识分子微妙的思想轨迹,发见了至今仍困扰我们的精神症候,再次引导读者回到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道路。

从表面上看,梳理历史者面对的是事实。然而,“看”的行为永远具有选择性。有什么样的观念框架,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正因为如

此,“主义”的退隐绝不意味着“学术”的凸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可以完全脱离“主义”的学术研究。正是在人们误以为“主义”退隐的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立场鲜明著称的新左翼思潮开始出场亮相,汪晖等人走向了当代汉语学术剧场的前台。显然,退隐的不是所有“主义”,而是其中的某些分支。如今,中国知识界再度兴起的左右之争,就反映了某种深层的观念博弈(如治国理想的冲突)。不过,单纯致力于派别地位的沉浮可能造成更多的精神亏损,真正有价值的是找到“致中和”的可能路径。由于当下的立场之争发源于现代性东渐的历史进程,因此,要进入“致中和”的境界,就必须重构中国现代性的来龙去脉,回到至今仍影响乃至支配我们的理论起点。恰是在这个维度上,王韬的思路清晰有力:首先,他不是泛泛地谈论现代性,而是指出后者具有两个维度——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并依此重构了晚清以降的群己之争,再现“中华现代性”诞生过程中的博弈、冲突、裂隙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其次,落实到具体的论述上,作者重构了科学主义、达尔文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对近世文学的影响,发现“中华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内部博弈并不均衡——强调群体主体性的流派长期占据上风,压抑和推迟了“己”(独立自我)的出场,因而预先决定了中国此后的坎坷路程。对于目前处于迷惘、犹疑状态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这种还原的功夫意义深远:它用史料本身说出了我们尚未完成并因而必须承担的使命,有助于我们估价仍在延续的立场之争。

作为舶来品,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命运可谓曲折多变。对于现代性的接受从属于一个悖论式的过程:一方面,率先现代化的西方借助科学、体制、理念的三重优势展开全球殖民运动,激起了被征服者(包括中国人)的持续反抗;另一方面,反抗者逐渐破译了西方强大的秘密,被迫踏上了现代化之旅。这种吊诡品格注定了后发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者不可能不受困于影响的焦虑。出于维护自己精神尊严的需要,接受者首先考虑的必然

是如何学习对方器物层面的长处而维系形而上维度的独立。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看,晚清知识分子首先服膺的是西方科学技术显然合情合理,王韬从科学入手还原现代性东渐的过程则抓住了要点。通过分析国人对科学的原初态度,他实际上揭示了“中华现代性”的早期危机:科学之所以能起到“以夷制夷”的作用,是因为它凸显的是人类普遍的主体性;故而,聚焦科学者所着眼的首先是“群”的重要性(作为人类分支的中华民族如何借助科学技术避免亡种灭族之祸),与“群”相对的“己”——无数活生生的个体——则因此被低估乃至遗忘。由于现代性本就具有群(群体主体性)己(个体主体性)两个维度,片面强调“群”不可能促进“中华现代性”的全面发育。这种形而上的欠缺集中反映在国人对进化论的重视上:进化论本属于生物学上的成果,但其对物种存亡机理的阐释又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客观上支撑着崇尚群体主义的立场。在“中华现代性”的生长过程中,崇群倾向不断获得强化,沉淀为具有支配性的集体无意识。即便是以启蒙为己任的晚清思想家,也未完全突破后者的边界。事实上,此间否定个体主权的观点都暴露出致命的自我矛盾:借口民智未开而反对建立现代体制,却只字不提大众的顛覆与政权形态的因果关系。当然,崇群派暂时占上风也是博弈的结果:在晚清的复杂语境中,主张“个体为真”的阵营还处于弱势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当时倡导个体主体性最彻底的流派当属女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前者尽管激进而深刻,但从性别出发的思路难以获得国人的广泛呼应;后者的“去国”主张既有悖于民族救亡的氛围,又与传统冲突,至多只能引发局部性的起义,注定难成大业。此后,对中国近世文学影响最大的两个流派——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强化了对群体主体性的建构。英国声名远播的大诗人雪莱就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来自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则直接催生了后来的红色意识形态。个体站不起来,国人自然难以“轮流统治和被统治”。于是,“立宪派”的主张曾经屡屡受挫。当近代文化接近尾声时,“中华现代性”的欠缺(个体主体性

的孱弱)仍未克服。这为中国后来现代化运动的曲折历程埋下了伏笔。

在王韬写作《西方思潮与近代文学》的 21 世纪,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崛起的中国也早已不是晚清时那个疲弱的共同体。然而,“群重己轻”的不平衡状态仍在延续,书中揭示的精神症候依然困扰着我们。欠缺总归要弥补,未完成的终究要完成。如果我们不能克服从早期“中华现代性”遗留至今的问题,那么,历史上的某些悲剧情节还会重演。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王韬重构历史时既致力于寻找“致中和”的超越视角,又总是表现出浓郁的现实情怀。与其说他关心的是已经消逝的过去,毋宁说他关注的是尚在形成的当下。这种担当精神推动他更投入地回到曾经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历史境遇中,增加了其论述的深度和广度。其文字则既承载着创造的沉重,又洋溢着解构的激情,展示了作者日益深厚的学术功力。不管未来的人们将走向何处,作者所做出的努力都具有值得珍视的价值。

01. 中国近代教育、文学的联动与互动

作者：朱文华

定价：40.00 元

ISBN 978-7-309-12101-8



02. 近代出版与文学的现代化

作者：栾梅健 张 霞

定价：32.00 元

ISBN 978-7-309-11182-8



03. 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

作者：王 韬

定价：34.00 元

ISBN 978-7-309-11054-8



04. 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1833—1911

作者：张天星

定价：34.00 元

ISBN 978-7-309-11301-3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西方思潮传入的背景	1
二、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与本书的选择	8
三、整体结构与五种思潮之间的联系	17
四、理论、资料的征引与创新点	21
第一章 成为信仰的科学	
——科学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28
第一节 不期而至的西方科学与技术	28
一、由“知识传教”开始	28
二、“晚清”的科学史定位	35
三、文学与科学主次易位	44
四、科学精神影响下的文学观念	50
第二节 科学小说的翻译与创作	59
一、翻译	60
二、创作	68
第二章 成为普世价值的达尔文主义	
——进化论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77
第一节 达尔文主义之辨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77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生物进化论的关系及其对旧文学观念的颠覆	77
二、进化论输入中国的两个来源	84
三、维新派、革命党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进化观	89
第二节 《天演论》与严复	95
第三节 作品呈现的进化论思想与文学观念的演进	108
一、乌托邦与种族论	108
二、革命文学中的进化观	115
三、王国维的纯文学观与梁启超的俗文学观	120
第三章 群体启蒙与个体启蒙	
——西方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126
第一节 一分为二地看启蒙	126
第二节 群体启蒙的主要趋向——论近代政治小说的产生及其“革命”与“立宪”主题	131
一、为群体启蒙而生的政治小说	132
二、“革命”与“立宪”的难题及解决之尝试	139
三、“革命”与“立宪”的对立统一	151
第三节 与“权”为敌——近代文学中“女权”与“无政府”思想之辨析	162
一、女权主义的诞生	162
二、以个人为本位的无政府主义	178
第四节 个体启蒙的其他呈现	196
一、章太炎论“独”	197
二、《人肉楼》与《因循岛》：《狂人日记》的前奏	201
三、刘鹗与《老残游记》：作为个体启蒙思维方式的例证	205

第四章 民族革命、诗、小说的罗曼斯

——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216

第一节 浪漫主义与民族革命 216

一、蜕变的浪漫主义与中国近代文界 216

二、生成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积极浪漫派 221

三、积极浪漫主义的救世与灭世 228

第二节 成为青春偶像的摩罗诗人们 232

第三节 风靡一时的浪漫小说 247

一、学不来的柯南·道尔 247

二、哈葛德为什么这样红？ 249

三、受《茶花女》直接影响的四篇小说 255

第五章 写实文学初传中国

——现实主义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 264

第一节 从“客观”到“批判” 264

一、强调“客观性” 264

二、突出“批判性” 274

第二节 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译介 285

一、“林译小说”与狄更斯、笛福的现实主义 285

二、《域外小说集》与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翻译与
影响 297

结语 311

参考文献 317

后记 337